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12月22日

有所思

# 南京大屠杀：中国之难，日本之耻

**编者按：**2014年的12月13日被设立为首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公祭日。我们不仅是用一个日期来对日军的暴行重申指控，而且是对日本至今缺乏彻底反思的反人类罪的控诉；我们设定这个日期，是为了有一个节点，每年都吸引人关注，对中国、日本和世界上所有人都做出一个提醒：没有理性约束和秩序维护，人类的罪恶很容易滑向暴行，冲突很容易升级为战争。对中国来说，自身不强大，不融入现代世界，付出的代价极其惨痛，南京大屠杀是国难；对日本来说，南京大屠杀才是其历史上不耻于人类的“国耻”。“知耻近乎勇”，如何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国耻，是日本政府及其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有知耻才能脱耻，不知耻本身更会为人类文明所不耻。中国设立公祭日，是要表明我们虽然可以宽恕过去，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让我们民族觉醒并且前行。

□刘庭华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期间屠杀中国人民最为残暴、最大规模的血腥暴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行为。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市中华门，国民党军自南京撤退。日军攻占南京市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展开了长达6个多星期的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大竞赛”。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火烧、活埋者计34万余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充分调查并获得大量确凿证据后，判处南京大屠杀直接责任者松井石根以绞刑；中国政府判处另一名主犯谷寿夫和其他几名罪犯以死刑。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与性质，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然而，在日本却有少数右翼势力分子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为代表的少数右翼分子，或发表文章，或举行座谈会等，否认南京大屠杀，竭力否认、歪曲历史事实，攻击日本敢于证实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正义人士和中国人民，企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但是，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 沦陷前的南京市人口与国民党政府放弃南京

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据”之一，就是说当时南京的人口总数只有20万左右。乍一看，似乎真把人蒙蔽住了。沦陷前的南京到底有多少人口？历史的真实是：1937年12月以前，南京拥有人口100余万人，由于战前疏散了部分人口，但仍有50多万以上，如加上国民党军及外地拥入的难民，大约有60万~70万人。1937年10月28日，日本外务省大臣广田弘毅自东京发给驻中国北平的外务省参事官森岛的一封电报说：“南京现有人口约53万。”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军在攻破南京城之前，国民党军队主动放弃了南京，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说，“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日军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因而，日军杀害的中国士兵实际上是已经没有抵抗能力的俘虏。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政府对首都南京的弃守问题，一直到11月中旬仍在举棋不定，迟至11月18日蒋介石才下决心坚守，并在作战会议上确定了守卫南京的作战部队和防御计划。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部队总计有12个师约11万多人。12月7、8日，日军逼近南京，9、10日各路日军先后进攻南京核心阵地。11日全线激战。12日，雨花台、中华门相继失守。当日下午，鉴于战场态势不利，国民党军决定放弃南京城，各部队自行组织突围。这种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突围，导致了突围中的一片混战，致使国民党军将近7万人成了日军的俘虏，后被日军残暴地杀害了。日军大规模杀害俘虏的暴行，严重践踏了国际战争法，是一种战争犯罪。

##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血腥暴行

日本右翼分子在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的同时，又心存余悸，于是不得不抵赖说“不否认日军也有军纪松弛的时候，发生过抢劫、强奸等暴行……这是部分士兵的紊乱行为，绝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犯罪”。血写的历史事实，决不会因为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分子的谎言而改变。

松井石根1937年12月7日亲自起草并签署的《攻克南京城纲要》中规定：“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




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16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其中有从镇江两要塞逃过来的人。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对1000、5000、10000之众解除全部武装都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来降，较为稳妥……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即处理了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处理掉1300人；仙鹤门附近已集中七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处理这七八千人需要相当大的壕沟，难以找到。作为一案，决定分成一二百人一批，诱到适当地点处理之。”

连师团长一级的指挥官都说“杀掉全部俘虏”，是上级的“方针”，并已带头执行，这能说南京大屠杀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吗？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是，1997年8月，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了1937年12月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的日记。拉贝先生虽然是一名德国公民及纳粹党员，但他却是当年在南京亲眼目睹日军大屠杀的见证人之一。《拉贝日记》中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近500个惨案。

原侵华日军战犯太田寿男少佐，1937年12月，时为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受命“处理中国人尸体”。日本投降后，先后关押在苏联和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忏悔撰写“罪行总结”书，供述了1937年12月中旬的5天内，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约15万中国军队俘虏和居民后，企图消尸灭迹的罪行：“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尸体约10万具，其中濒死者约2100名。加上南京其他部队处理的5万具，共15万具。这些尸体中，中国士兵约3万名，其余都是平民，男女老幼都有。”

二战结束后，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和国际公约及惯例，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在东京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并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中国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核实，最后判定集体大屠杀共有28案，被害数19万余人，零散杀害中国军民858案，被屠杀15万余人，仅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南京崇善堂这两个慈善机关合计掩埋尸体就达155337具，被害人总数达34万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证言”，认定松井石根犯有策划、组织南京大屠杀罪行，并据此判处他以绞刑。中国军事法庭判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以死刑。东京审判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判决是不容置疑的，完全公正的。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根据从各方面获得的许多确凿证据，“发觉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的无辜良民，抢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将日军的暴行“力求真切，不存偏见”地公布于世，在1938年7月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郭沫若当时为该书作序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

史　镜

# 胡旦点津的警示

□王丹誉

北宋王辟之在他的笔记《渑水燕谈》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某吏为一贵侯作传，早年贵侯是以杀猪为生的屠户出身，直笔实录恐不雅，若曲笔回避为其隐，又恐失实。于是请教老笔吏胡旦。胡旦告之：“贵侯早年操刀为业，即有主宰天下大志。”或曰：“贵侯少年时执刀，即令群猪丧胆；将军风度其时已露端倪。”读罢，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叹服胡旦的超强“策划”能力，贵侯的爱慕虚荣之情，以及当时竞相吹捧的腐败世风也跃然纸上。

胡旦何许人也？他是滨州渤海人，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戊寅科状元，生于955年，卒于1034年。从故事中不难看出，胡旦是一个精通世故“老油条”，久历官场的“官釉子”。某吏可能是因为从业不久，经验不足，良知未泯，所以才会陷入“直笔实录恐不雅，若曲笔回避为其隐，又恐失实”的尴尬境地。在此关键之时，老吏胡旦指点迷津，将贵侯早年拎杀猪刀这个习惯性的动作，说成魏武帝当年“魏王床头操刀者乃真英雄也”的“操刀”，并将杀猪宰羊这种在当年最下贱的粗活儿，美化成“主宰天下”的壮举。同样是一把刀，但杀猪宰羊之此刀，绝非魏武英雄之彼刀；同样是宰杀，主宰猪羊性命的屠夫，也绝不是主宰天下的雄主。胡旦这种比拟虽然不合实情，但既没有弄虚作假，也没有违法乱纪，却能在无声无息之中给贵侯树起“光辉形象”。对于那位新手某吏来说，老吏胡旦真是醍醐灌顶，一言千金。

贵侯是一个爱慕虚荣的显爵高官。看起来，贵侯和这起策划毫无关联，但细想就能发现，其实贵侯正是这起策划事件的幕后总策划，又是他一手导演这场闹剧的始末，并且又是该剧最大的票房得主。谁让某吏写传，某吏又因何犯难，又如何恰巧遇到老谋深算的高人胡旦，并且能那样简单地得到他仙人指路般的点拨？把这一连串的疑点连接起来，不难得到答案：策划者就是贵侯。胡旦这位精通世故的“老油条”，之所以能帮某吏出此妙计绝招，正是因他不仅对贵侯的身份、地位、性情、喜好等等都了如指掌，而且对官场风俗、世道人心皆烂熟于心，才能不费吹灰之力，信口支出此等高招。故事还描写了某吏和胡旦许多慎重讨好的心态和做法，都能看出贵侯此人，不仅身加显爵，更有高官和实权，同时也是一位喜欢被人吹捧，爱慕虚荣的伪君子。因此，才使新手某吏左右为难，也能让老吏胡旦极尽奉承之能事。

从文中读者既看到栩栩如生的胡旦，也自然而然地想到活脱脱的贵侯。可见，作者王辟之先生笔墨老辣，文字传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了他那双雪亮的眼睛，那颗正义之心。王辟之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官场上竞相吹捧。作者深入挖掘出活灵活现的人物事例，再加上个性化的语言，戏剧性的情节，辛辣的讽刺。作者通过这则妙趣横生的故事，把大宋开国（960年）到哲宗绍圣（1094年）年间北宋130多年的官场描绘得淋漓尽致。

读罢此篇，在捧腹大笑之余，不禁想起了当前一些“新闻策划”。策划者不要学胡旦再世，被报道的典型也不能当贵侯重生，而我们的记者呢？千万别学习胡旦能博贵侯一时之快的“点子”，而是要好好学学作者王辟之写千古文章的公正。

# 人生易老　江天万里霜

## ——毛泽东1929年在福建时的处境与心境

□倪德刚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来到福建上杭县，住在临江楼。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重阳节期间福建根本没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词的末后一句，道出了毛泽东当时的悲惨处境与霜的心境。

## 屡受打击的处境

**“开除党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朱毛”之争与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准备赴俄留学”。**对于“朱毛”之争，很多年前是一个忌讳的问题，近些年来，党史界多有研究。实际上，其争论过程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的是毛泽东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林彪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专门讲了“朱毛”的争论。这封信收录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中。

井冈山时期“朱毛”争论的起因很多，争论内容更多，仅就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就列了十四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等。

在这些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毛泽东说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毛泽东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时即动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朱、毛没有离开部队。然而，毛泽东却因与陈毅之争，离开了部队。

**“毛陈”之争与毛泽东的“两次”处分。**作为红四军“三号”首长、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对于朱、毛之争一直起调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前，给毛泽东致信，让他参加会议。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此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处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毛泽东的“讣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转移到福建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虽然是因误传而发的讣告，但说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 “万里霜”的心境

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不满36周岁。“人生易老”是感叹，“万里霜”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见当时毛泽东赋闲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亲人的程度。

**“饶丰书房”。**毛泽东离开部队后，“到闽西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定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为什么起“饶丰”这个名字，饶有兴趣，丰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赋闲，读书取乐吧。

**《模范英语读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随邓子恢转移到福建上杭县，在苏家坡住了一个多月，“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反正，无所事事，学点英语消磨时间呗。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击或疾病缠身时，往往想念亲人。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毛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1927年8月31日离开杨开慧，整整一年没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击能不想老婆孩子吗？

## 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则，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于是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